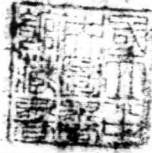


29.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吳敬恆題



第二卷第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新世序的建設	錢端升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之研究	梁寒操
總理總裁的政治哲學之探討	韓梅岑
總理自由思想申義	葉青
總理的大同思想	呂調陽
總理教育思想導論	晉啓生
總理軼文四篇及其考證	劉子健
總理革命史話	謝君韜
總理庚子惠州之役	鄧慕韓
總理信徒應有的努力(編後記)	編者

南京圖書館藏

新世序的建設

錢端升

戰後的未來的世界究竟應是怎樣一種秩序，各有各的看法，動輒不同。不同的原因則由於態度的各異。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因為對人的態度不同，故二者所倡立身涉世之道亦大異，同樣的各人對於此新世序的看法，亦隨他對於人性所持的態度而異。有的人認為經此次大戰而後，人類會有根本覺悟，可與為善，故願以建設理想的和平為構的，而不必斤斤計較民族本身的利害。有的人認為此次大戰而後，將有第三次，第四次，乃至第無數次大戰發生，故新世序的建設應以有利於我民族的強大為前提。因為對人類好戰或不好戰的態度根本不同，故所期望的新世序亦大異。

要於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中，採取其一，實在不是一件等閑之事。愈是平正謹慎者愈會感覺抉擇的困難。兩者間之缺乏調劑，與真正的折中看法之不存在，使抉擇的困難益見增加，蓋一般的極端之調劑可有調和，但上述兩種態度則不易有調和。自以為能持折中的態度者，如果加以嚴格的解拆，則仍可歸納為兩種極端的態度之一，不是鄙人願今後能有和平且應有和平者；便是認各民族間今後仍將有不斷的鬥爭。

我自己的態度是傾向於理想主義的。寧願為環境重於遺傳。姑不論人類的本性好戰或好和。我們如果能造成一個和平的環境，則從使天性好戰的民族也可受和平的感化。我以為理想可以勝現實，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即是最好的現實主義者。我們如有崇高理想，輔之以偉大的氣魄，及堅毅的意志，則一切現實的環境均可克服。所以從革命的精神言，那種深抱和平不能樹立。第五次大戰無可避免，因而於討論到此大戰後的秩序時，處處偏重我們一民族的利益的態度是得不的。

即退百步而單為我民族的利益着想，我們也應當誠心誠意地求一個和平公正的世序的現實；而不應多設障礙，偏重與國防有關的諸種問題。我們須知，在各大國中，我們的國防最薄弱。我們如可講國防，旁鄰也可講國防。

大家交誼國防，則我們的國防仍感薄弱。我們重國防而旁鄰則齊心一意於理想的和平的建設，我們的軍力乃可出人頭地。我們的國防乃可固如金湯。這種單相思的便宜事既然不能行，則我們更不可不備理想，力戒猜疑。總而言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言之，我們如要人家力行和平無所自氣，我們自己先須力行和平，無所自私。

如果我們國人全能採取理想主義的態度，則理想的世序應以完成下述種種為目標。

第一、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或人類政治單位之間，應有永久的和平。這一點為人類進步求生存的最低條件，無須闡說。

第二、在新世序之下，各民族各國家或政治單位，能有集中全力以求內部精神及物質上進步長育的可能，不受外界的干涉。不受戰爭的威脅。在過去，因為戰爭的存在及民族富於侵略性之故，這種進步或長育的努力常受不正當的干涉或牽制。這種努力，新世序應予以保障。但各單位求長進的努力應限於對內；對外的努力便無異於侵略了。

第三、在新世序之下，各民族各國家或各政治單位應有共同的努力或國際的活動，以增加共同的福利。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在今後絕對是不可能的；所以國際活動今後勢將比昔日增加。這種活動如果能增進共同的福利，則必將對於若干單位為有益。新世序的責任之一，即在如何使這種活動能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或一切單位達願。

要使新世序能完成以上所說的三項職務，我以為我國對於新世序應主動下列五個原則，牢守不移，以冀為和平會議所接受。

(一) 應有一包括一切國家或政治單位在內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不特一切獨立國家為會員國，即未具完全獨立資格的單位亦應有參加之權。過世的國際社會以國家為主體，故嚴守獨立國家與不獨立單位間的分別。今後世界社會應以全人類為主體，故即未具獨立地位的單位，如果他不是一團

案的完整部分之一，亦應予以參加之權。只有如此才可使民族國家對立的時代進為世界大同的時代，亦只有如此才能逐漸消滅殖民地或藩屬的劣制。又這個世界組織應具有彈性，庶幾可自一個散漫的國際組織進而為一個世界政府。

(二) 世界組織應具有國際武力及制裁破壞和平者的可能。國際武力與有效的制裁，是相輔而不可分的。時至今日，很少人不主張世界新組織應具有有效的制裁；很多却仍懷疑設置國際武力的可能。實則設置國際武力，一切制裁的議論均成空談。根據過半的經驗，沒有國家甘願以其武力，打壓侵略者。除非他自己就是侵略的對象。故我們必須要求設置國際武力，打入移出移，或是資源的分配轉運，均應建築於平等、合作、及互助的原則上。此事包含廣大、性質複雜，入手亦不易。但新秩序的安定及有序的合作非此莫辦。故新秩序建立之始，我們必須排萬難以使經濟關係踏上平等合作互助之道。我們中國固不是具有經濟大力的國家，但我與各大國間的經濟衝突也無他們間相互衝突之大。我們如無一點自私之心，一心一意主張公平，我們所發揮的敵國應從寬大。聯合國家，受日德義諸國的侵略，今方作重大的犧牲，怨恨敵國，人之常情。但為永久的和平計，此種怨恨，不可歷久。我們應力主解除軸心國的武裝，毀滅其侵略政權（日皇室在內），並負不亞於我們所受的損失。我們所以作此主張，却不是出於仇恨，而是為和平、為公平。但除此而外，我們應讓昔日敵國同有享和平的權利，而世界則成戰勝國與戰敗國兩大壘。

(三) 各國內部應有徹底的清淨。殖民地問題不解決，則民族的鬥爭及經濟的衝突俱告存在，而一切崇高的理想俱歸於空。但空言解決，而不腳踏實地，屬求實地的進步，則徒使殖民地的理想無歸宿。但空地位與殖民人民以互惠。我國非殖民國家，亦不需要友邦的殖民地，其價值維持對殖民國所有的善政，並從而促進之。為正義計，我們即開罪非國家亦無所惜。但為公平計，我們亦應尊重殖民國家之正當利益。我們應竭力主張將殖民地改歸新國際組織保護或統治，而以非殖民國人民為保護或統治的主體與者之一。

以上所述雖備五端，但建設新秩序的主要問題不外此。我們即對此五端能有一種一貫的不自私的合乎理想主義的主張，則我們的建議可有被世界民族的力量，再可被各國採擇而把握。我始終以為能利人的辦法即是人能利己的辦法。我們此時應高瞻遠矚，不狹於一時一己的利害，而以全人類億萬年的利益為我們考慮新秩序的出發點。

(五) 殖民地制度應有徹底的合理的建設性的清理。殖民地問題不解決，則民族的鬥爭及經濟的衝突俱告存在，而一切崇高的理想俱歸於空。但空言解決，而不腳踏實地，屬求實地的進步，則徒使殖民地的理想無歸宿。但空地位與殖民人民以互惠。我國非殖民國家，亦不需要友邦的殖民地，其價值維持對殖民國所有的善政，並從而促進之。為正義計，我們即開罪非國家亦無所惜。但為公平計，我們亦應尊重殖民國家之正當利益。我們應竭力主張將殖民地改歸新國際組織保護或統治，而以非殖民國人民為保護或統治的主體與者之一。

以上所述雖備五端，但建設新秩序的主要問題不外此。我們即對此五端能有一種一貫的不自私的合乎理想主義的主張，則我們的建議可有被世界民族的力量，再可被各國採擇而把握。我始終以為能利人的辦法即是人能利己的辦法。我們此時應高瞻遠矚，不狹於一時一己的利害，而以全人類億萬年的利益為我們考慮新秩序的出發點。

以上所述雖備五端，但建設新秩序的主要問題不外此。我們即對此五端能有一種一貫的不自私的合乎理想主義的主張，則我們的建議可有被世界民族的力量，再可被各國採擇而把握。我始終以為能利人的辦法即是人能利己的辦法。我們此時應高瞻遠矚，不狹於一時一己的利害，而以全人類億萬年的利益為我們考慮新秩序的出發點。

(以上接第一三頁)

至老，孜孜兀兀，小一些說無非滿足自己生存慾望，充實自身生活內容，推而廣之，就是要為家族，為鄉里，為社會，為國家，為全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因之我們可以明瞭所謂「生」就是為人類生活，職業生命，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活計而「行」。所謂「行」，也應當為人類生活，職業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活計而「行」。

這樣建設下「行」的新的理論，祇是教人去「履踐篤實」「貫徹始終」的去力行「行」，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與「知難行易」的原意，是一樣的。總說也是認定只要去「力行」，任何事情都可成功，他說：「我們行的出發點，只要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教人而不是害人，循此而行，前進不輟，就不見有什麼難行之事，亦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篤行」「實行」，這便依舊又把「誠」與「行」看做是一致的，所以吾們認為政治的動力，發之於內的是個「誠」，表現於外的是個「行」，發於誠的「行」，便是「力行」，力行就是「行易」。

七 總理 總裁之政治思想實現以後

總理 總裁的全部政治思想是根據於三民主義的，他的政治思想是徹底實現，也便是整個的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

總理革命目的，是以救中國為起點，最後的目的還是在救世界。三民主義按總理自己說「是打不平等的」。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不平等，都打成平等，這叫平等。總理明白表示過，乃是世界一切人類的平等。他說：「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民族平等。一國民族絕不認為他種族所壓制；民族主義，即人人平等，絕不讓少數人壓迫多數；民生主義，即貧富平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

這種道理想是以民族自強，民族平等為基礎，在步驟上是先把自己的民族弄好，恢復自己的自由平等，再去喚醒帝國主義的鎖鏈下世界其他各小民族，提掖之，扶植之，使其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總理對於「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我們要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的天職，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植它，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它。

所以總理和總裁的政治思想，是救中國，救世界，救人類。我們說他是世界上最進步的最偉大的政治思想，誰曰不宜？

要研究「知難行易」這個道理的真相，可先研究中國人思想之歷來對知行的認識。知行問題最早見諸典籍的是傳說對武丁說的兩句話——「知之而行之難，行之難，則知之易」。這兩句話流行於兩三千年，深入人心，影響至大。不過我們關心研究當時對武丁說這句話的用意，目的原不是要使武丁以知易為難，以為難，而是向他陳述了一大堆如何做好皇帝的道理，生怕他不肯實行，所以上加這兩句，乃是激勵他要注重實行的意思；同時傳說所說的「知」和「行」原是一回事，傳說所說的「知」也是兩樣。傳說所說的「知」比「行」更難，所以說「知難行易」。這道理原不是科學的知，和普通人說的知便大不相同。所以傳說這句話在學理上原並沒有什麼價值的。不幸世人不知，誤解了他的真意。遂使三代以後，中國文化一蹶不振，這恐怕是傳說所預想不到的吧。歐美社會因為沒有遭受這種邪說的教訓，所以文化進步，日新月異，他們不斷的向前求知，向前力行，而且實實在在是在現在優於過去，將來優於現在，把黃金時代放在前面。而中國人適又相反，無論什麼都是古代比現代好，總是一代不如一代。談政治的，就一定以唐虞三代為政治。因此託古改制，物足適腹之風，隨時可見。其實從歷史研究，堯舜禹湯是不是真有其事，這是一種疑案，至於無懷氏葛天氏之世，更是虛渺無稽。因為深信古人，把黃金時代放在過去，其流弊一方面是產生許多假古董，貽害後人，一方面造成一種現實，夢想羲皇的不良風氣。等到外來文化侵入中國的時候，國人受到巨大的打擊，才引起思想的改變，如西晉六朝以至隋唐這一時期，當時佛學東來，民間風靡，佛家對宇宙人生觀察的精微與見解的透闢，使當時知識份子驚奇不置。他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梁武帝以天子之尊，尚捨身同泰寺。玄奘不惜遠涉數萬里，冒山川風雪之苦，赴西土取經。到這時候中國社會發生一種反動，自命衛道的士大夫階級遂起而攻擊佛教。轉念作原道，至魏因「人其人，火其書」的主張。後者如程朱都怕「異說」的猖狂，繼從故紙堆中找尋宇宙人生的真諦，以明理學。以先聖先賢之遺，抗拒外來的「文化侵略」。不過他們都未找得真正的科學方法，僅是層層剝理，且專從形而上方面去推測，便走入了玄學這一途。例如太極圖說之類，其研究不以人生社會為對象，而憑空去體悟宇宙的來源，結果也不免徒然博得「空明」兩字，流弊所極便為後來主張實踐的理學家予以「林間嘍嘍續猿」的諷刺。宋儒的迂闊而不切於事功，究無補於國家社會，所以到了明代遂又引起

三民主義

新的反動。王陽明最初本治程朱之學，曾經格靈前的竹子格了七天，直至生了病，還格不出什麼道理來。於是廢然思返，沈思熟慮，揭出程朱所見之非。把思想的對象，由空虛的宇宙返諸實在的人生。這種主張，自是較前人為進步。但在實際上研究，這種說法究竟對不對呢？總理批評地：「他人為善之心，誠為良善，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違。」因為王陽明原只是只知注重道德方面，研究不當如此一時，而究無補於人心世道。

(2) 良知與真知

說到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了。總理既認定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是一種錯見，為什麼總裁講行的道理（行的哲學），又主張「有良知便能致」，這其間是不是有矛盾呢？我以為是沒有的。我們仔細研究起來，「知難行易」的「知」與「致良知」的「知」根本是兩件事。「致良知」的「知」是良知良能的「知」，人人俱有，不學而能。而總理說的「知」乃是科學的良知，不是容易得到的。你看孫文學說中屢舉「為證」說的都是科學的知，就可以明白。所以總裁這種說法與總理知難行易之理實在并無矛盾。其實良知與真知都各有其價值。比方孝順父母，不說謊，這是誰都曉得是應當的，但為什麼世間偏尚有好說謊和不孝父母的人呢？就是因為有良知不能致。在人類生活中真知固然重要，良知也實不可遺。良知是人格的事，真知是知識的事，兩者都不可偏廢。

我們就普通人日常所說「知」字來仔細分析，實在可謂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是「知」如其然，二，是「知」如其當然，三，是「知」如其所以然。如果說格的正名第一種可說「覺」，第二種可說「悟」，而第三種才可說「知」。比方拿一個茶杯來說，這是一個茶杯，圓的，這是覺，就是知其然。其次，這個茶杯是花了多少錢買來的，現在是戰時，物物艱難，我們應該好好的愛惜它，不讓它被打破，這是悟，就是知其當然。再次，這個茶杯是怎樣構成的？包含有那些原素？自泥土變成杯子經過多少手續？這種時發生什麼作用？瓷是怎麼東西？為什麼一燒便光亮起來？……這許多問題，假如不是工業化學家就不容易解答，即使是專家也不能完全了解。這才是知，就是知其所以然，把前因後果都原原本本的知得清清楚楚。王陽明

總裁的政治哲學之探討

韓梅岑

總裁的政治哲學，便是總裁的政治哲學。因為總裁是總理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總裁的言行，就是總裁的政治哲學。因為總裁是總理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總裁的言行，就是總裁的政治哲學。因為總裁是總理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總裁的言行，就是總裁的政治哲學。因為總裁是總理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總裁的言行，就是總裁的政治哲學。

同時參酌中國國情，摘取歐洲社會科學中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已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應有的完美的思想體系，其博大精深，真可以說推之世界而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古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總裁的政治哲學，當然便是本乎全部的總理遺教，由上一段話說明，是不十分容易的工作，現在祇可以作一個簡約的敘述，而且這祇是一個嘗試。

一 先從宇宙觀人生觀說起：

要明瞭總裁的政治哲學，必須先從他的宇宙觀人生觀說起，因為他的政治哲學思想，是本乎他的宇宙觀人生觀而來的。總理對宇宙的觀察，他說「生」是宇宙的中心，整個宇宙，為一生之巨流，萬物都在生生不息的向前進化，沒有生的宇宙，那便不可想像，所以總理會說：

「宇宙的本質，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也不是對立著的物質和精神，而實另有物在，……他們背後，尚有一個主要動力在，這就是生按。總理這意思，「生」就是宇宙的本體，也是宇宙的法則，生是

合精神與物質為一的「實在」，生是精神與物質之體，精神與物質是生之用，是生之本。這樣的認定宇宙是一個生的創造進化的歷程，由於這種觀點，他也認人人生在這個創造進化的宇宙中，也就必得是適應了這個「生」的規則，來不斷的創造，人不能離開宇宙而存在，人的生命不能和宇宙的生命以及社會的生命分割，因此人也便不應該違背了宇宙的大自然「生」的法則，總裁有兩句話說明這種革命的人生觀，最為深刻而明確，他說：

「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體之生命。」

這是多末正確的至理名言！總理也說過：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

由這些昭示看來，革命的人生觀，是前進的，積極的，創造的，服務的，利他的。總裁的政治哲學出發點和歸宿點，內容和外像都是基於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二 唯生歷史進化論的民主政治思想

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的主張，是根據總裁的歷史進化論而來的。總理認為歷史是進化的，歷史進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就必得實行民主政治不可，在人類奮鬥中，總理有過這樣一段話：

「人類奮鬥，可分幾個時期……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用國同爭，這個民族互相爭，在這個時代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國同國爭，到這個時候，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

總理是用唯生歷史進化論者的態度，來研究政治發展的事實，現代民主政治是歷史進化的結果，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主權在民，為什麼現在要政治的主權在民呢？總理說：

「因為從前的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明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

在那個時代，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該讓路，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民權呢？因為文明很進步，人類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在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倚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以上已經說明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歷史進化的根據，歷史的力量是最偉大的，歷史決定下來的東西，誰也不能阻斷住這個潮流的趨勢，這權力最好比黃河的水一樣，是直瀉而下的。

三民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容，既然是主權在民，就是總理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人民所共有的國度裏，各民族是一律平等，其間沒有肉肉富食的现象，人民所共有的政治，在政治地位上人人是平等的，沒有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的區別，人民所共有的利益，是一切生產分配均平，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他的一個根本精神，便是平等。這便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的特色。

三 政治建設的中心目標

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的確政中心目標，是要實現民衆利益和幸福，所以建國大綱第二條首先聲明：

「建設之當要在民生。」

這是一語破的的話。政治的建設，雖是經緯萬端，結果不外民生兩個字，總說：

「我們所以要革命，要從事政治建設，我們之所以要管理素人的事，要做到人無游民而各盡其才，地無荒土而各盡其利，物無廢棄而各盡其用，時無虛靡而各得其宜，事無廢舉而各舉其效，最後惟一目的就是要使天下萬事物物皆安，各得其所，全體人民個個都能安居樂業，足食足衣。」

「本來政治的內容，分析起來，雖然包括經濟教育倫理社會軍事交通等等，但綜合起來講，就下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一切政治設施，無非是要國家富強，民生樂利。」

由於這些訓示，可以知道政治建設的目標所在，就是一個「民生」問題，民生的範圍包括了「食衣住行育樂」。總說：

「使全國民衆衣食住行育樂六端要能修屏決，才算民生主義實

現了。」

實在說來，整個的三民主義，便具有以民生主義為中心的單一性，主權雖有三個，——民族民權民生——但是都是為了能解決一個民生問題，民族民權民生，都是用以解決民生問題所採取的三個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民生問題表現在民族上，換言之，就是民族上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表現在政治上，換言之，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表現在經濟上，換言之，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表現在社會上，換言之，就是民生問題。這道理論的根據，是由於總理的「民生史觀」做出發點的，為什麼政治建設要以民生為中心？應當在此中求其解釋。

四 總理總裁是主張法治？人治？禮治？

總理的法治哲學究竟是什麼？法治？人治？禮治？解答這個問題，在現在還有許多不同的見解，這都是由於對總理總裁的政治哲學不能作全部的觀察的原故，我們的解答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在形態上當然是以法治為本，而是以禮治人治為其條件的」，他是把法治禮治人治，這三種治術之優點，融合而貫通之，而且一新其內容，來配合應用。要論總理總裁的「治術」，實在是一種法治禮治人治的混合物，但是在形態上，還是一個法治。

（一）關於法治的說明：總理制定的建國大綱，第一條開宗明義的就顯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總說解釋這一條的意義說：

「這是一種開宗明義，指示建國的根據，……：我們要挽救危殆的國家，以建設新國家，必須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的指導原則，就政治方面，最要緊的就要有一個復完備的政治機構，來推行政務，所以關於政府的組織，要以五權憲法為根據。」

當然政治形式，是一個法治形式，政府的組織以「五權憲法為根據」。當然政治形式，是一個法治形式，這是沒有疑問的事，試再看總理規定的建國程序，在軍政時期是要行「軍法之治」，在訓政時期是要行「約法之治」，在憲政時期是要行「憲法之治」。從此更可證明這個政治形態是法治了。

總說並且說以下的幾句話：

「現代政治與現代國家，都是以法治為本，國家一切事務，無不是

這一定的法制，在正當軌道上推進，不如此便不是現代政治。」
這已經明白說出吾們的政治是法治為本，但是祇是說了為「本」，總
總說却也不忽視禮治人在政治上的重要輔助作用，以及與法治的不可
分性，對於這一類的調劑還很多。

(二)關於大治的說明，總說也說過：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育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教育有道，則天無不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不擊之士；任使得法
則朝無不任之徒。」
總說還指出人盡其才，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是「百事興」。他深知
道人的條件，在政治上的重要，才確立了考試制度，以選拔人才使政治的效
率增大，五種憲法中便規定有考試院的設立，建國大綱上第十五條還規定如
下：

「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鑑定資
格乃可。」
這種完善的選賢設能，是為發揮人在政治上的作用，總說也有過這
樣的訓示，他說：「為政在人」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從來講政治的人，可以說
沒有一個不是注重在這個根本問題，所謂「任官惟賢才」，所謂「徒法
不能以自行」，「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以及「德，必當
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這一類話歸納起來，就是「選賢任能」
四個字，所以政治建設的要務，是在訓練人材，考選人材，和任用人
材。由此就可知政治上的條件，是不可少的，講法治也就必得有人去運
用才行，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有良法必須有良人」。這樣的來講人
才，可見與「法治」有絕大的關係。

(三)關於禮治的說明：總說主張恢復中國民族固有道德，實在也是一
種提倡禮治的思想，他簡直把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做為恢復民族地
位的一種方法，他說：
「我們要恢復民族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
有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固有的道德是首，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
平。……」
這種固有道德，提倡其在政治的作用上，和在民族地位的作用上同其
重要，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便是禮治運用上不同的一些方式。總說更把禮
字看做是政治的法則，他說：

「講到政治的法則，乃全在於「禮」，並且要知道這「禮」與「誠」
兩個字，是互相表裏的，所謂「誠」者，就是「誠」於中，所謂禮者為
是誠之形，外也表現。」
總說把禮與誠，看做是一件事，所以禮才不是「虛偽形式」，「繁文縟
禮」，他又把禮給了一個新的解釋，是「規矩矩矩」的態度，或嚴整整肅的
紀律，這樣一套禮的新內容，已經不是一般的所謂舊的禮治了，「規矩矩矩
子說：『嚴整整肅』內含義，便是一種『自然法』，禮成了一种廣義的法了。曾
子說：『法出於禮』。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都是
一個意思，國家的禮治，到了總說手中，革新了內容本質，這是不可以忽視
的一點。」
總說怎樣的把儒家禮治改變成了新的內容，且錄他自己的那段話：
「在中國政治哲學上很明顯可以看出大部分就是倫理哲學，從一個人的
修身到親親，再從親親而推到睦鄰任卸，推到了仁民愛物，甚至一切
的制度組織，也染上不少的倫理色彩，這是中國倫理哲學的特點。我
們在現在時代來看，因為社會組織的不同，似乎覺得宗法觀念，或家族
主義，和現代不合，但是祇要將已失時代性的部分，如九經裏面所講
的，以「尊其位重其祿為親親的表現」之類，不擺在制度表面去，專就
倫理來說，仍不能不承認中國政治哲學，將一個人由內發展到外，將一
個人對於外在的關係，一步步的推廣開去，是層次最分明，而步驟最確
實的，照我個人的見解，政治條件，應當包含著軍事經濟文化的種種，
但政治基礎，實在是倫理上面，這樣才是它最有根據而最完善的。」
他乃是把倫理思想，不合時代的部分去掉，使它完全時代化，這樣一來
，原來的東西，實在便發生了本質上變化，已經不能再把它看做是昨天的舊
事物了。

(四)在以法治為本之下，入治禮治如何配合？說起這三者的配合，理
由非常簡單明白，法是一個死的條文，法儘管完善周到，沒有良人去執行它
好的法，若是落到了壞人手中，這種壞人，更會任意操縱法律，做為作惡的
工具，魚肉人民，良善的法，便立刻變為壞的東西，所以說：「有良法必有
良人」，這都是說明法治與入治的關係。

至於法治與禮治，也是有其依存性的，禮治的作用，是從人類本性上，
啓發人的自覺的，法治乃是代表著國家公共權力而帶着強制性的，禮治不僅
指明某種行為是正當的，而且從人生意義上去探求，為什麼這種行為是正當

的，法治祇是行爲的正當與不正當，不容人民逃避其所當爲或不當爲而已。有一個法治，是可以叫人作惡，再加以上一個禮治，才更能夠勸他向善，法治與禮治相輔相成，才有一個完整的作用，所以 總裁說：

「我們從事現代政治建設，一方面要守法重紀，一方面要明德修身。」

「一方面大家注意明德修身，便不患無『治人』，一方面大家守法重紀，便自然有『治法』。『治法』、『治善』、『法善』、『官賢吏能』，現代政治建設國家當然立即可以建設起來。」

這一段話，已經明白說出「法治」、「禮治」、「人治」的配合作用了，其間固然是以法治爲本，但是人治禮治的輔治，也是不可或缺其一的，這種政治哲學「政術」的創立，古今中外，還未曾觀。

他的理論的出發點，是因爲人和社會是一個理性感情利害的結合，必須以法來範圍其利害，以禮訓練其感情，以人表率其理性，才能使這個人類社會有秩序，有組織，互助合作，向前進化，三者缺一，便不是完整的力量。

總裁在講述國程中有三段話：

「建國第一時期——即軍政時期——要行軍法之治，這個時期最基本的的工作，是建立革命武力，以掃蕩革命的一切障礙，這要特別說明的，就是所謂武力不取於軍事，軍事之外，同時要有教育和經濟，配合起來，才能構成整個武力，……教育更爲重要，講到教育，就要使受教育的人，發揮其智識道德，體魄和靈性，而所謂智德體靈四育，在這個時候是「軍法之治」，自然是以一種法治爲主，但是却注重教育，發揮智德體靈四育，這中間雖然有在法治之中，實施一種禮治的訓練的成分，至於人的條件，在軍政時期是不可少的了，另一段話：

「再講訓政時期：總理遺教規定的很清楚了，訓政時期，是實行「約法之治」，主要工作是要開始實行地方自治，同時則要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在「約法之治」時期的工作，倫理建設，就是1.心理建設2.倫理建設3.社會建設4.政治建設5.經濟建設。」

地方自治，應包含五項建設，就是1.心理建設2.倫理建設3.社會建設4.政治建設5.經濟建設。便是在政治上的條件的培植工作。另一段話：

「憲政時期，實行「憲法之治」，成立國民大會，選舉政府，完全依照五權憲法與建國大綱所規定，政權爲全國人民所共有，治權爲全國人民

公意所選託。」

這三時期，一方面是「法治的完成」，一方面是人民經過智德體靈四育的訓練，達到了理性的較高階段，是「禮治的成就」；一方面吏治人民所選之賢，這三段話，已經充分說明在法治爲本之下，「人治」與「禮治」相輔爲用的方式和效用，不是這樣，便不會有革命建國的成就。

五 政治哲學上的方法論

總理 總裁政治哲學上的方法論，是採自儒家的大學中庸，而加以時代的內容，條理順序是「由內而外」，「由己及人」，他最稱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章，總裁會把這一段與三民主義對照著來講述，他說：

「大學之道，就體的方面言，是從「明明德」做起，其次在「親民」而心「至善」爲止，就用的方面言，是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爲歸。

總理的三民主義與知難行易的學說即是始於「衣食住行」之微，而極於「大同之治」，以「知難」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所以 總裁的主義學說，除形式上富有時代的色彩外，其本質方法作用，完全與大學之道相符合的。

總裁說爲「革命之學，大學之學也。」所以他說「三民主義」就是「明德」「親民」的道理，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講，總理對民族主義的主張，便是要先由團結家族做起，然後到宗族到國族，先民族主義鞏固，然後才去推行世界主義，這都是大學上「爲什麼革命要先「革心」，要先確定革命的「人生觀」？「革心」確實革命的「人生觀」，就是不使那天命之「性」汨沒，而是淬礪它，光大它，這就是「明德」的工夫，明德之後，由此道去「接近民眾，喚醒民眾，爲民族謀福利」以復興民族，這就是「親民」的工作，結果一切行爲都極重德，極有效果，而「完成革命之使命」，就是「止於至善」了。

怎樣來完成這由「明德」以至「止於至善」的全部工作，詳細的辦法呢，當務是「格物」的解釋，總裁講做：「格物就是分析事物之理……譬如如何信譽革命？我們要先分析信譽要革命的內容……又進一步研究怎樣才可完成革命？」

總理自由思想申義

葉青

一 自由底重要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裏頭，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這是確實的。但孫先生所謂民權，通常叫做民主，無論如何，二者相關。看他說的這句話吧：「中國革命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那末「民權和自由並列」豈不就是民主和自由並列嗎？自由底重要於此可見。

當然，事實確是要「有了民權，……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沒有民權，……自由不過是一個空名詞。」所以「自由……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之上。民權發達了，……自由才可以長存。」（孫）如果把民權換成民主，這就是說，自由依存於民主了。很對。然而這是一點也沒有減少自由底重要性的。孫先生把民權主義底實行分成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雖經過三時期底政治皆為民權，即皆為民主，但就自由說來，則是要憲政纔有的，至少也是要憲政纔充分的。很明白的，軍政是軍事統治；訓政是人民專制，憲政是在和平狀態。有經驗的人民來管理地方和中央的全部國事。這時的人民自然享受自由了。所以自由與憲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因此種種，叫喚民主的人在其叫喚民主時注意自由；叫喚憲政的人在其叫喚憲政時亦注意自由。他們對於民主和憲政雖然以為有參於自由的意思，其叫喚自由，把它看成民主和憲政底重要部分，則很顯然，難道實驗出版會結社自由這不是常見於他們口上和筆上的東西嗎？自由於是成爲了問題。這裏所謂他們，即叫喚自由的人，主要是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其實，自由問題之出現於中國不自今日始，而有其更早的時期。提出它的人也不

是共產黨，而是提倡新思潮的人。所以孫先生說：「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得很詳細，說爲很重要。」他又說：「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起來提倡自由。他以為歐洲革命，像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可見「自由的學說也是歐美傳進來的」。確實，自由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其爲中國「許多學者志士」或「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所提出，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底時代。它爲五四新文化運動者從歐洲輸入的東西。孫先生在十三年講演「民權主義」時，曾與以批評。他以為要求自由的「這種實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澈底了解。」因此他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的」。同時他還指出「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裏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孫）等等弊端。可憐今天叫喚自由的人，不注意孫先生底批評。而以「新青年」或「新學生」及「志士」自命者，反把自由看成爲一個新的問題。彷彿他們之提倡也有創始意義似的。而且好像不解決就不得了的樣子。其實又何嘗如此呢？理由容後談及。而且好像不解決就不得了的樣子。其實又何嘗如此呢？但不管怎樣，自由問題却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對於它必須有一個深確而系統的研究，使人有澈底了解，並且完全了解。它是解決底時候了。要研究自由問題，我以為應當從自由底意義開始。

二 自由底意義

孫先生說：「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够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爲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大家都莫明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稱是和自由種彷彿的，就「放蕩不羈」一句話。雖然放蕩不羈，就是和放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這種自由底解釋是絕對的。

然而我們可以看出自由就是不受拘束的狀態了。「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率往自如」，不是一種不受拘束的狀態嗎？「放蕩不羈」，不又是「一種不受拘束的狀態嗎？不受拘束即是不受壓迫，因為拘束來自壓迫，如果沒有壓迫可言即沒有拘束可言。」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率往自如，你能够「放蕩不羈」，全在你未曾受着壓迫，以所以我們可以從消極方面說自由是不受壓迫的狀態。

那末自由便發生於受壓迫的情形之下了，因為要有受壓迫，纔有不受壓迫可言。否則不受壓迫之官刑等等於無的放矢。不受壓迫即自由，受壓迫即不自由，既然受壓迫而後纔有不受壓迫，那末自由而後纔有自由。所以自由是在受壓迫下的要求。確實，要患過病的人纔曉得健康是幸福。更確切地說，惟有不被逮捕因而被監禁的人方感覺到自由之可貴。不然，自由何物呢？

自由就有一定的時代性了。它底要求和可貴便在此時代性上。所以自由不是超出時間空間，而隨時隨地都可以主張的。那末自由底時代為何物？要解答這一個問題，還須明白受壓迫不是就一個人或少數人而言，因為一個人或少數人底不受壓迫，根本沒有時代意義，歷史之劃分時代是以事關全體人至少亦關多數人為標準的。所以自由底提出在於全體人或多數人受壓迫的時代。全體人或多數人即構成人民。那末自由底提出便在人民受壓迫的時代了。

人民受壓迫的時代在歷史上是封建時代。歐洲情形可作證明。孫先生說：「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都是很專制的。」因此「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所以一聽到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極歡迎……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熱血。」他們當爭自由的時候，敢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

從此可知人民受壓迫是在封建時代，而自由底要求却在封建時代之末。因為人民要在長期受壓迫中纔能漸漸有自由之念，而一經發出自由要求，封建底喪鐘便響了。從另一方面說，封建底喪鐘一響，新的時代即民主時代就因之而開始。所以嚴格說來，自由是處於由封建到民主，即由中古到近代的過渡時代之中的。只有這個時代是人民覺醒要求解放的時代，是自由底時代。

中國呢？情形亦復如此。「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孫)。雖然「自秦以後」，「中國歷個人民所受專制的痛苦」不及歐洲，那不過是說「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而已。到了清朝，加上種族關係，那就使得「中國人民無一不被困於黑暗之中了」。(孫)。所以人民受壓迫是很顯然的。

那末國民黨在清王朝下以同盟會之名主張自由，就非常適當了。同盟會底「軍政府宣言」，是一次出現於中國的自由宣言。辛亥革命以後，滿清王朝是推翻了，封建餘孽的北洋軍閥依然壓迫人民。國民黨繼起要求「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同樣是非常適當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黨綱第六條，是正確的主張。

從此可知自由底要求是對着封建勢力的。其在中國的時代性便顯然是：在滿清王朝之末和北洋軍閥之實了。人民受了封建壓迫，國民黨為之要求自由，不僅十分必要，而且當有進步意義。革命黨之要求自由，但精確地說，還須加兩個字，即：自由是不受封建壓迫的狀態。這「封建」兩個字甚為重要。自由之可貴者在此；自由之成爲要求者在此；自由之成爲問題或時代問題者亦在此。

三 自由底主義

受了封建壓迫的人民，要求自由，是應該的。但要說明這個應該，就非有一種理論不可。換成別的話，說明這個應該的，就形成了一個理論，此理論不管其爲主觀自由的理想或代替封建的程度上說，都是一種主義。其在歐洲，叫做民主主義。這就是與民主主義相同而又較爲進步和較爲完善的民權主義。前面我已引過孫先生說要「有了民權，……自由才能存在」那一些話。

「自由實在包括於民權之內」的，要「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自由」(孫)。

但中國底民權主義必須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面積可。否則單純的民權主義將因民族主義之未實現而無法實現，將因民生主義之未實現而變成虛偽。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解除封建壓迫時有消滅民族壓迫和預防經濟壓迫的必要。因此，說明中國人民應該自由的理論實在是三民主義。

確實，三民主義是爭自由的房子。茲請分別說明一下。

首先拿民族主義來看。孫先生說：「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這個「種族上不平等」產生於民族的壓迫，否則即沒有「種族上不平等」之可言。那末「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不就「消滅民族的壓迫嗎？所以民族主義即不受民族壓迫的主義，亦即民族自由主義或種族自由主義。

其次拿民生主義來看。孫先生說：「民生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這個「政治上不平等」產生於政治的壓迫，否則即沒有「政治上不平等」之可言。那末「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不就「消滅政治的壓迫嗎？所以民生主義即不受政治壓迫的主義，亦即民生自由主義或政治自由主義。

最後拿民主主義來看。孫先生說：「民主主義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又說：「民主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貧者反對富者的反動」。可見這一個「社會上不平等」產生於經濟的壓迫，否則即沒有「社會上不平等」之可言。那末「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不就「消滅經濟的壓迫嗎？所以民主主義即不受經濟壓迫的主義，亦即民主自由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

並且，我們可以看出三民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其範圍大而完全。舉凡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俱包含在內。這三種自由獲得了，一切壓迫解除淨盡，因而一切自由完全獲得。所以三民主義即爭取自由中最完全亦最澈底的主義，這勝過只主張民族自由的國家主義，只主張政治自由的民權主義，只主張經濟自由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正因爲這樣，以三民主義爲主的國民黨，是中國首先揭出自由之旗幟，自由由奮鬥數十年的黨。它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之役，反對北洋軍閥的討袁護法北伐諸役，抵禦帝國主義的抗日之役，即可作爲證明。老實說，它是不實現三民主義不會停止的，因此就是不實現一切自由不會停止的。

四 自由底問題

那末，要主張自由就要主張三民主義了，並且還要信奉它和實行它。三民主義完全實現之日，就是自由完全實現之時。我們不能在三民主義之外去講自由。三民主義之外是沒有自由的。這就是說，自由在三民主義之中。因有了三民主義就不應再有自由底問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成別的話，即無異於說，自由應以三民主義爲原則。凡不合於三民主義者不能自由。這是對的嗎？我們已經說明明自由是不受壓迫的狀態，因而表現出「能夠活動，來往自如」或「放蕩不羈」之象。所謂「能夠活動，來往自如」或「放蕩不羈」，就是爲所欲爲的意思。例如說所欲說的話便叫言論自由，結所欲結的社便叫結社自由，那末自由就是爲所欲爲的狀態了。確實如此。難道爲所欲爲還不是不受壓迫的狀態嗎？

但所謂「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也就是思想。爲所欲爲即照着思想去做去的意思。事實上，人會有一個爲或行爲不是照着思想去做去的嗎？所以自由是照着思想去做去的状态。人底自由所以異於動物的自由者如此。這就是說，人底自由與所謂思想，就是思想。當然，思想不是主義，而主義則必是思想。那末，照着思想去做去就是自由，照着主義去做去亦是自由了。而思想之有邏輯或系統者便成主義。所以思想是主義底低級形態；主義是思想底高級形態。於是照着思想去做去的自由是低級的自由；照着主義去做去的自由便是高級的自由。

其實，一個人的思想，一般說來，無論對此事或彼事，在今日或明日，要皆合於邏輯，自成系統。因之入爲不各有其主義，所以不同者，在其主義之爲自然生長性的或目的意識性的而已。所以凡照着思想去做去即是照着主義去做去。那末自由是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了。

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即是自由。所以凡照着思想去做去即是照着主義去做去。那末自由是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了。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即是自由。所以凡照着思想去做去即是照着主義去做去。那末自由是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了。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即是自由。所以凡照着思想去做去即是照着主義去做去。那末自由是照着主義去做去的状态了。

那末中國自由應以甚麼爲原則呢？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是於中國情形，爲各種黨派所擁護故，於是中國自由就是三民主義的自由了。『前書』。孫先生底意思形像這樣，他說人民要「誓行革命之主義當得選舉權

這一步說，我們還應該為國家民族而犧牲個人底自由。孫先生底意思正
是這樣的。他說：「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
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帝國主義底侵略，……要將來能夠抵抗……
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土敏土參加散沙裏結成一
塊堅固石頭一樣。」所以「自由……萬不可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
，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

如果不這樣而斤斤於個人底自由，則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滅亡了，個
人便成亡國奴，那裏有自由可講呢？而且斤斤於個人底自由，則凡利於己者
皆做，日本能使你隨意發射便隨日本走，豈不變成漢奸了嗎？今日談自由者
總不做這樣，其以自由為標榜民族團結，削弱抗戰力量，實有助於日本，亦為
民族底罪人。這種超出民族範圍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犯罪。

依照民權主義，個人底自由是以平等為原則的。孫先生講民權主義看重
平等，自當如此。要平等便須各有界限而不相逾越，所謂界限在這裏就是法
律。蔣先生說：「民權主義本乎法」。確實，民權主義是法治主義。那麼依
照民權主義，自由就在法律之中而不在于法律之外了。

實際上，「自由不是天賦的，而是法定的。」（據著「三民主義與自由
」）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其實不對。「人在降生以後，始而受父母
的教訓，終而受老師的教訓，並不是自然生長的，即是說並不自由。如果該
個人自由，便是與便穿衣解便都不知道怎麼做了，要個人的生活，必須接受訓
練。不接受就要遭父母和老師底打罵，初無自由可言，為甚麼呢？因為法律不
來保護之故，如果到了法律所規定的公民年齡，一入社會，便誰也不能來打
罵了，倘有其人，訴諸法律，他便要受制裁。可見自由是社會的權利，為法
律所賦與。」（前書）。憲法之規定自由權利，即是證明。

因此，要享受自由便須承認法律；承認法律便須遵守法律。自由以法
律為界限」（前書）。如果超過了它，就是侵犯他人自由，因而就是犯法
，亦即犯罪，應受制裁。然而今日的人多不明白這點。常有把與有夫之婦發
生關係看作戀愛自由者。其實這是侵犯了那個夫低自由，在法律上叫做通姦
。但是今日的自由多以此類。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幾許罪惡假
假之名以行」。我們不禁有同樣的感慨！



自由既以法律為界限，所以不談自由則已，談自由即須承認法律，總
法律。你能怎樣，便誰也不能干涉你了。如果否認法律，那就是否認自由。
如果否認法律後還有自由可言，那就不是自然權利論，便是無政府主義。實
屬空想。其與民主無關，則可斷言。根據民主來談自由，是不能自外於法律
的。

依照民生主義，個人低自由不是利己主義至於允許人壟斷社會經濟的。
孫先生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
」。所以民生主義是注重全體之生的主義不是注重個人之生的主義。這自由
非由平均地權限制資本國營實業已達到共同享受之目的不可。生所以個人
在經濟方面的自由應以全體之生為原則，即是說不能傷害它，且應為着它。

這就須在尊重全體之生的立場上限制個人底自由了。「平均地權，則土
地底佔有自由，買賣自由，享受自由等皆不能存在，節制資本，則資本底
佔有自由，增殖自由，經營自由等皆不能存在。國營實業，則私營在種類
、規模、發展等等的自由皆不能存在。如果存在了，平均地權限制資本國
營實業底理論便無由成立，其實際便無由施行，所以民生主義在經濟上是反
對放任主義，主張干涉主義的。這還不根本否認了自由嗎？」（據著「三民主
義與自由」）

所以民生主義在實行時不主張個人底自由，還要犧牲個人的自由或限制
個人底自由。這是不可避免的事。

從此可知，三民主義之所謂自由，是全體性的而非個人性的了。當然，
全體獲得自由，個人自然獲得自由。但在全體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個人還要
犧牲自由。在全體獲得自由後個人自由也要受限制的。所以三民主義對於自
由的態度，是主張合情的自由，合法的自由，合理的自由，即主張有組織的
自由和有紀律的自由，因而把自由置於全體性的利益之上。這是對的。

至於無限制的自由，絕對的自由，在事實上不會有過，如果有來，並非
人間幸事，那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民族和知有自己而不知有他人的自由。其
結果不受政治專權，即發生經濟斷斷。這是自由就為少數人所獨享，變成
多數人受壓迫的原因。自由產生了不自由。這樣的自由便為三民主義所反對
。所以三民主義主張的自由，是具有完美性和永久性的。

總理的大同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禮記禮運大同篇

這是我國二千多年以前的一段理想社會的模型，却被 國父孫先生用來作為三民主義的最高目的。不僅使三民主義有了崇高偉大的理想，更使大同

主義第六講中說：

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國同之治。……這便是我

講中說：

，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主義第二講中說：

六序，什麼事都可以共的，人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

二民主義的修補目標。 國父不僅

遺訓」上，還說：「三民主義，吾

說明大同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密切關

於少數人之懷疑大同主義非孔子的學說

三民主義的將來，大有「革命何時了

呂調陽

不知三民主義是有目的有方法的。正因為有大同主義的目的，所以三民主義才較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更完美而更徹底；又因為有三民主義的方法，所以大同主義才能由幻想而進於實際，猶之滄魯東等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至馬克思便變成科學社會主義一樣。如果能依照這方法，繼續努力，則不難由三民主義的逐步實行而達到大同社會的實現。

不過時人對於「大同」那一段話，有兩種不同的解說，一個說它是民生主義的描寫，一個說它是社會主義的描寫，二者皆有理由。

依照前一個解說「大道」就是民主主義。意思就是：民主主義實行了，國家共和，不屬於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個人；在內政方面，政府官吏概由人民舉賢能來担任；在外交方面，是信守盟約，敦睦邦交；在社會方面，人人都是國家的公民，關係有如同胞，壯年有工作，老幼各得其所，鰥寡孤獨殘廢亦不至流離無依，男女適齡而婚嫁，狹一井然；在經濟方面，盡量開發，互通有無，大家勞動，互相扶助。自然，人人相親，家給人足，流氓性的盜賊就沒有了，也就無須關閉外戶。這就是民主主義發展的極期。

再照後一個解說：「大道」就是社會主義。意思就是：社會主義實行了，世界一家，沒有國界；關於共同事務，推舉賢能來担任。大家遵守信義，彼此親睦，人人都親愛如兄弟，所以老是衆人之老，幼是衆人之子，毫無你我之分，這在養老有院育幼有院的情形之下，必然如此，壯者有工廠，鰥寡孤獨殘廢者各有衣食，男女婚姻自由；財產歸公，無私有私事，勞動社會化，毫無為己；大家親愛，坦白無私，當然沒有盜竊亂賊之事。外戶也就無須關閉。這就是未來社會的情形。

這兩種解說，在表面上雖相反，而實有其相同之點，從哲學上說，二者都是以自然物質為基礎。即是民主主義者根據自然權利的理論，代表平民向貴族戰爭，取得了自由平等的權利；同樣地，社會主義者又根據這種理論

政治平等是不够的，必須要實現經濟平等自由平等幸福等口號，而他們的社會主義上二者間是以自然權利為基礎的，最後

的社會主義，乃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致使奧文，消魯東和傅利耶等的理想發展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階段時，自自然領域而移向於社會的領域，因而根據經濟進化，唯白言之社會的經濟所決定，與自然的人立於資本主義上的一點，所謂

空想的社會主義了，不然，它怎論，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確

的，何況古代！包有大同

同權有拍拉圖「共和國」的

無須致疑於經濟的大同論了！

即在康有為底「大同書」中也還是空想的

基礎，所以他始終是把大同主義與君主立憲相並行，則其不能實現也毫不

覺怪！坦白說，即必須到「國父手裏」才能得到滿底的實現，即是有三民主義作為實現大同主義的實質基礎，不論在政治方面，有了民族主義和民權

主義作為實行真正民主主義的基礎，而在經濟方面，又有民生主義來完成社會革命的條件。因此大同主義必須有三民主義作為基礎，然後才能由空想而

自由獨立與世界」：(一)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即承認中國境內各民族之解決，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二)是「聯合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共同去抵抗世界的列強，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權」；(三)是「濟弱扶傾，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律平等，共生共存」；(四)是「至打倒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後，用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平為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民權主義是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合一，其實行的方法：(一)是使人民有權，即人民應該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以管理政府的行動；(二)是政府有能，即政府應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發揮高能的力量，以為人民做事；(三)是權能分治，即把政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消權完全付託於政府」，「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使「人民和政府的力長……彼此平衡」；(四)是計劃民權，即由軍政府而改進而憲政的有目的有計劃地去實行民主政治，以發揮科學的目的意識性，這是自然生長性的歐美民主主義所不及的；(五)是全民共治，即不分男女，職業，階級，不受財產限制，使全體人民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大家都能參與政治，享受民權。總而言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如能實現，自然在外交上，是「講信修睦」，在內政上是「選賢與能」了！民生主義是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合一。其實行的方法：(一)國營實業，即「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二)是節制資本，即用「直接稅稅」；「方法，就是用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使私有資本不致過於膨大，且日漸為國家資本所吸收以至於消滅；(三)是平均地權，即「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稅收法」，及「地價稅法」，以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作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稅稅，並於必要時依報收買之」，以漸次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四)是全民共享，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關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得利益歸國家公用。如是，則凡現在種種苛捐雜稅，概當免除，而實業陸續發達，收益日多，則教育，養老，

被災、治病、及大改良社會、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達之利益舉實、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至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此即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如此、則大同社會主義自然可以實現。不然、國父在實業計劃自序中、何至有「以化彼族競爭之性、而建我大同之治」的樂觀表示。

總而言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是實現大同民生主義的政治基礎、民生主義是實現大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正因為有前者的政治條件、所以使後者的經濟設備得到更徹底的實行。如國父一則說：「以愛以教、實任國道」、再則說：「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付這四種（衣食住行）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負擔這四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向國家要求」。更因為有後者的經濟設備、所以使前者的政治理想得到更大的發展。又如國父所說：「在此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中、吾輩為此世界三大問題而實行一實行之解決」、即將現代所紛爭不已的「國際戰爭、商業戰爭、階級戰爭」一齊來消滅、以實現互助服務的大同社會。因此、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在中國來一次完成、是不僅有了自然的基礎、並且具備了社會的條件、正所以使經濟落後國家、保除經濟落後國家的壓迫、消滅殘餘的封建勢力、躍過資本主義階級、達到大同社會的實現。所以三民主義是科學的、是實現大同主義的真實基礎。

不料近來一般論大同主義的人、常將大同主義與共產主義混為一談、甚至將兩種主義混為相等。實則國父分別大同主義與共產主義最為明白、前面已經說過、大同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真正目的、並不止是共產、而是共有、共有、共享、什麼事都可以共的。依據國父遺教看來、大同世界是比共產社會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胡漢民先生曾說：民族主義的理想是比共產主義更積極性中。如果這話不錯、則統攝世界主義、試看國父在演講民生主義時便將大同主義列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後、即可證明。

那些以共產主義與大同主義混為一談的、是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推演而來的。他們以為到了共產社會、其經濟結構上面的政治等上層建築、必然和它的經濟基礎趨於一致。就是說、經濟上如果是共產制度、則政治上必然是無政府、民族間對黨團間的界限也必然消滅。所以、共產社會一名詞、是以經濟現象系統政治現象而說的。事實上、世界各國決不能於極短時間內、一齊來實行共產主義、必然是時間有先後、在另一方面、必不至有許多矛盾和戰爭的事實發生。是無論對內對外、仍然需要防止反動和維持革命政府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許多經濟發達還不及英美那樣的

三民主義年刊

國家和區域、還需要政治力量來實行消滅私人資本和發展國家資本的建設工作、蘇俄便是最好的一例。像這樣看來、世界革命的完成、還要藉上層建築的政治力量來使之推進、因為共產社會實現的區域有先後、所以共產主義一詞不能包括世界主義；又因為共產社會實現的區域還須用政治力量來作國內建設或對外戰爭的工作、所以共產主義一詞又不能包括攝政府主義了。因此、可證共產主義只是大同主義的若干環節中之一環節罷了。

正因爲這樣、所以大同主義必須要有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因爲必須有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才使世界主義底於實現；有了民權主義、才使無政府主義底於實現；有了民生主義、才使共產主義底於實現。明白些說、民族主義是在求國際間或民族間地位的平等、民權主義是在求政治地位的平等、民生主義是在求經濟地位的平等、即必須此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完全平等以後、大同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是以一部份的經濟力量而概括整個世界革命、宜其不能得到實行的結果、即云實現、亦只屬於一部份經濟已經發達的國家、實不若民生主義可以實行於一切國家。因爲從抽象方面說、它是解決一切時代一切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爲任務、其所得結論便爲民生哲學、如民生爲歷史活動的中心和民生爲社會進化的動力是；而從具體方面說、它是解決某種時代某種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爲任務、其所得結論便是民生主義、如國營實業、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便是其基本方法。是民生主義又被共產主義爲完備。且民生主義又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一部份、三者實有連環的作用。是則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俱已完備、又有方法、有計劃、則其達到實現大同社會的目的、尙不甚難。試看國民黨執政的十五年中、其種種建設之興飛盛進、實可爲今後成功的佐證！因此則毛澤東等視三民主義爲共產主義的低度政綱的種種曲解、自可不攻自破。

最後、徵引國父演講軍人精神教育中的一段訓示、以作本文的結束：「新世界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從民而已、舉凡救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共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供給幼者、老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在後始及於貧苦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國家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養以教、實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政府之計劃、虛構近之。……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中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眾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負責任、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遠勝莊嚴嚴厚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歐美而上之。」

總理教育思想導論

晉啓生

一、總論

自民國十七年四月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推行三民主義教育學，接着十八年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以後，距今已有十五年，但是三民主義教育理論與計劃尚未完整的建立起來，全國民衆和青年實際上還沒有普遍的受到三民主義的教化，這是戰時以及戰後教育上的基本問題。研究總理教育思想的興趣，一方面在作教育學理的探討，一方面是探求這些基本問題解決的途徑。

總理一生盡瘁於革命的領導和研究。他在辛亥以前的中心工作是預備籌款，外交與起義。辛亥以後從事討袁法與北伐，對於教育事業很少躬親實施的餘暇。但是經過了一部分不肖黨徒數度叛變之後，他就見了革命教育是培養革命武力實現革命建國的工，乃命蔣先生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因而奠定後來完成北伐和抗戰建國的基礎。他對於教育很少專門著作，只是從遺教中發見教育的言論，多至數百言，少或數語，然皆博大精深，振古鏗今，略加發揚，即可成爲完美的教育思想體系。

總理對於教育功用非常重視。他說：「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又說：「教育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地無無抑鬱之士」。又說：「那班少年受了教育，十年之後，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驅逐你們前輩去辦學」。以此可見總理認爲教育是人類所必需，是發展實才傳遞文化的工具。

總理教育理論對古今中外，求其至當，他一方面發揚中國古代教育的精神，一面發揚蘇聯及歐美的教育制度。他說：「蘇聯教民貧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又云：「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讀書

，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了的時節，國家便有養老費」。又云：「美國的教育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遍國無論男女都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這種既不同步自封又不自甘抄襲的研究態度，實足爲教育者效法。總理的教思想內容極爲豐富，茲分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各種教育，教導方法數點略述之。

二、教育目的

總理對於教育目的有幾段話非常精闢：「學校之目的於讀得識字學問知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因爲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又因爲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要求知識」。諸君學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從什麼地方學起呢？簡捷的就是要從學問上學起。諸君現在求學的時候，便要從今晚學起，愛惜光陰，發奮讀書，研究服務人類的各種學問」。由以上幾節的解說，簡言之，教育目的在傳道知識，培養道德與注重雙手萬能，以求人類文明的進步。

總理的「道德觀念要從學問上學起」的說法與古代的蔡格拉底，柏拉圖的「知識即道德」的意見有相似者。他的「雙手萬能，力求實用」的說法實爲今日「教育與勞動合一」及「行以求知」理論上的依據。總理的力行哲學，認爲「致知在於力行」，「不行不能知」，實爲總理此種思想影響，現在流行的生產教育，勞動教育，勞動服務的主張亦多由此孕育出來的。

三、教育政策

總理關於教育政策的意見實爲三民主義教育制度的骨幹，我們應極重視

。其要點有數點：

(一) 政教合一 「真能教民養民莫如三代。其時非由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如爲善矣」。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生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教養保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爲保護教育其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以上一段話是說國家應負保民教民養民之責任，即「政教合一」「管教養衛合一」的意思，到後一段話是說革命黨在訓政時期應負保護教育民衆之責，及其能力充實然後實行憲政。歐洲在宗教革命以後，教育權力由宗教及私人手中收歸國家管理，於此足見中國古代教育的特色。總教所提倡的「管教養衛合一」的理論，實淵源於中國古代教育的精神，而對總理政教合一的教育政策進一步的開發。

(二) 教育實施 教育不特要政教合一，而且要教養兼施，前者是說明政治對民衆教育的責任；後者是說明教育經濟的關係與教養的並重。總理在北伐宣言中曾列舉國民革命最低限度之政綱六條，其一與五兩條說：「中國對於國際平等地位之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文化及教育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進，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事業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知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有一次演講中，又說：「現在廣東辦了不少的平民學校，窮家的小孩餓水上的兒童，和鄉村的兒童誰不能修得到平民學校去讀書呢？……鄉下的小孩子丟去放牛，每年要繳幾塊錢，水上的小孩子要去划船，每日要繳兩毫錢。因爲他們不賺錢便沒有飯吃，沒有飯吃，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會有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他們怎麼能去讀書呢？要那些窮家小孩都能讀書，不但是學校內不收學費，有書給他們讀，還要那讀書的小孩子有飯吃有衣穿有居住，要那些小孩子自下世以後，自少長成人，國家都有教育養，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擔憂，才能安心送小孩子去讀書」。經濟困難是教育不能發展的最大原因，生計艱苦是民衆不能接受教育的主要障礙，所以總理主張國民經濟與文化事業同進，教民與養民並重，總納言之，即是主張教養兼施。蘇聯第三次經濟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

一方面普及國民教育，並提高國民教育程度，故能逐步貫徹，實爲教養兼施政策的良好例證。

(三) 均權制度 總理對於行政制度主張「均權主義」，對於教育行政制度固不能例外，他說：「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分政，此種之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醫療地方情形而異，此種之屬於地方者也。……同一教育之實施，區宜側重水產，山谷之區宜側重礦業或林產，是固宜予地方以積極之自由。然學制及學務教育年限，中央不能不爲劃一之範圍，是中央亦不能不週聞教育事業矣」。

世之論教育行政制度者，軍自由發展者則主張地方分權，如英美制，軍權齊劃一者，則主張中央集權，如大陸制（法德等國），實則今日英美漸有集權趨向，法德亦漸趨適度地方之需要。總理「均權主義」實爲現代教育行政制度之新源，亦三民主義教育制度建設之指針。

此外 總理手定之中興革命方略中有詳細的行政組織系統，內務部教育司，總督府內務司設教育科，府知事署設第三科，司各級教育行政的工作，確爲配合當時行政制度之教育行政系統，亦足爲今日教育行政之參考。

(四) 經費政策 總理的經費政策極爲徹底，有偉大的新貢獻，他說：「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的生利的事業，……要歸多數人，大家認可以平均受利益。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究竟做一些甚麼事呢？就是要辦教育，國家有了多餘，便移作教育經費。……國家的歲入在日本有十幾萬萬，中國要大過日本十幾倍，國家建設好了，至少可以收入一百萬萬，那樣的收入，應該作什麼用途呢？要由國家撥十幾萬萬專作教育經費」。一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應予諸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一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教育幼養老濟及其教育或衛生各項之需要」。一或要經費無所出，此不足憂也，以人民一月義務勞力之結果，必足支持此費……自治區之人民各有雙手，只肯各盡其長，則萬事俱備矣」。一辦

果能打破錢的束縛，不要錢去辦學，從前北京大學沒有錢辦學，各校學生到各處募捐演講，便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總理對於教育經費政策的意見可括為數點：(1)發達國家資本，增加國家收入。(2)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3)庚子賠款完全用作教育經費。(4)地方收入，用以經營養育等事業。(5)自治區內各人以義務勞力辦教育，以求獨立自給。(6)智識份子應盡教育的義務，不要錢去辦學。以上數點，實為解決教育經費問題的要端，也是教育建國的步驟。

(五)普及教育。總理對於「普及教育」異常關切。他說：「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教育，令普通的人都能得到教育」。所以他在中國國民黨之政綱中曾有一「推行普及教育」之規定。

總理認為教育應是人民應享的權利，都應有平等的機會。他說：「凡在自治區域的少年男女，皆得受教育之權利，貧賤與富貴之衣食，皆由國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隨級畢業而進，以至大學而後止。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為年長者養育知識之所」。

又云：「現在國民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普及之權利應為普及及教育應是人民的權利，民治的基礎，故應機會平等遍施於男女少年與民衆，不應因富及地位而有不同。

(六)國防教育。總理在民族主義進行本自序中有創作「國家建設」之計劃，內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種憲法，地方自治，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部，後以孫傳芳於火，計劃未得實現，殊為中國革命的大損失。惟民國十年七月八日致廖仲愷函，略舉其「十年國防計劃書」之綱領，得國防計劃之端倪，其關於國防教育者有數點：(1)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2)國防之原則。(3)國防之建設大綱。(4)國防之與三民主義，五種憲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之關係。(5)發達國防教育計劃。(6)各種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中教育會議之屬，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整理國防建設。(7)軍事教育之改革。(8)訓練計劃。(9)進修計劃。(10)軍人訓練計劃。(11)軍人訓練計劃。(12)軍人訓練計劃。(13)軍人訓練計劃。

國防教育規模之宏大，舉凡計劃教育，軍事教育，科學教育，無不概括，實為建國教育之典範。

四、各種教育

總理對於教育目的及教育政策之意見已如上述，其教育理論之新穎與正確，於此可見一斑。至於各種教育之實施以及教學訓練之方法，亦有種種精微獨到之訓示，茲分述之。

(一)師範教育。總理說：「諸君畢業之後是去教人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培養人才就是師範生的責任」。他並有學識方法可在教育，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做人的最大事情是甚麼呢？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怎樣可以管國事。中國人教育有四萬萬，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然教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得東師範，此師範學校所以重要也。而於女子師範尤為重要。以上關於師範生應負的責任與應有的修養，師範教育之目的與重要意義，師範教育之目的在教人做人，即教人做國家管政事，實為國家的棟樑，亦各師範教育共同之理想。

(二)農業教育。總理對於物質建設極為重視，故對於農工商教育，甚為注意，他對於中國農業教育的理想，即達到「地盡其利」，即須「農有官，農務有學，耕種有藝」。至於發展農業教育的方法，則有幾要論：「先設農師學校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觀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各省，分設農學，以觀農家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農家相表裏，廣集四方物產，與老農五種考證，此為辦法之綱領」。今日職業教育，不脫「洋八股」氣味，尤以農業教育為甚。總理「雙手萬能」理想，實為治本之良策，而「農師學校」之設，專門培養農業學校之師資，亦應備其意而辦之，亦為活潑之要聞。

(三)黨政訓練。總理很重視黨政干部的訓練，他說：「今後之改組，則黨黨員應從新再去徵革命奮鬥工夫，但革命奮鬥工夫，必須有方法，而方法則從訓練而來」。而本黨改組後，以嚴密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訓練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俾能成為黨主義義，運動黨素，組織政府之使用的人才。一選黨組織地方自治教育或辦一個地方自治學校，不送就這東西來引人才。到人才來了，到我們這裏來教訓，我一定會給你們一職三任，讓你們去試驗，有了成績，再推廣到全省，以至於全國，亦應申黨民便可以大治。

(四)軍人教育。總理對於軍人教育遺訓最多，而以軍人精神教育一書為其代表。茲錄其關於軍人教育之遺訓，以見其對於軍人精神教育之重要。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教育為何，即軍人革命精神也。一精神者革命成功之左券及担保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要為革命，能則是非，明利權；識時勢，知彼己，然後斥右邊派，無不如此。第二之要素為仁，而所以發

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第三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較強健足以應敵，而又須明生死之辨，不然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現在求學時代，能夠獲得多少便多少，其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以上三點歸納言之，革命是非常事業，必須非常的精神教育；革命的基本在深探學問，而學問必須有革命精神來運用，方能發揮其功用。此種精神教育不深探學問之於革命軍人，並且實踐全體國民，實爲起點。……（五）留學教育。總理對於留學教育有幾段話：「至於人才之解決，有二法焉：一爲多開學堂，多派留學生到各國之科學專門學校肄業，畢業後再入工廠，練習數年，必使所學能升堂入室，四國能獨當一面以運籌策，斯爲上着。」……「我們立志還要合乎國情，像四十年前許多留學生到外國去，……以爲到了美國只要學成了美國一樣便夠了。……許多外國留學生回來，都說外國現在這國文明的緣故，是由於他們有一種特長，……從前雖是富強，現在才足爲窮。此外在二十年前防制對策中對於留學教育曾數次提到。……總理認爲留學教育要與國情需要作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施行。

五、教導方法

總理關於教導方法有許多很精彩的意見，茲歸納三點略述之。
（一）行以求知。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其目的在鼓勵同志力行。……（二）適應個性。總理曾說：「我們要曉得畢業的知識是很低的，要教訓畢業，指導畢業，或者是教訓知識很廣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做本。這樣的手續工夫方有意味，方才得到益處，方才能夠感化多數的人。」又說要「發展兒童本位的教育」。總理認爲教導應適

應個性，替受教者打算，不好拿教育做標準；即是「因材施教」的意見。
（三）培養國民道德。民族主義講論中國於此種思想應隨處盡示，要養成服務習慣。……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便不知自己是高麗人了。……著不覺之聞知人所盡絕之。……民族精神之方，旨在恢復民族自信力，而恢復民族自信力之道，則應恢復民族道德與提高民族智識。……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再是信義，其次是和平，……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極清愛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理論。……先恢復道德，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者要從自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服務的新道德。……這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新道德，只能爲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於衆人的，做成了什麼事，便能爲大家謀幸福。」……不以奪取爲目的」的人生觀，非特是教育的正鵠，也是人生的軌範。

六、結論

總理的教理想，斟酌古今，融合中外。其實教育目的，則以知識道德與生產勞動並重，其實教育政策，則主張政教合一，教養兼施，均有制度，經費籌備與供給義務努力。普及教育以及國防教育，則主張各種教育，則主張兼籌並顧，並各有其到之見地；其實教育方法，則主張行以求知，……科學的主張，所以能成爲崇高博大，而又實可行的完美教育思想體系，若能循此探源，觸類旁通，並因時因地，以制其宜，實爲三民主義教育理論與實施的本源，抗戰建國一切文化建設的準繩。

總理軼文四篇及其考證

劉子健

總理之遺世，忽忽已經過了十八個年頭。而總理的全都遺教，尙未能與國人見面。雖稱完備的國民本「總理全集」，幾乎成了「毛筆稿」，不可多得。近年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努力徵求的結果，軼文軼事，民智本，又增加二千九百六十四篇。可惜遲遲未出版。並且，我們相信，遺教之散在民間的，一定還不止此數。作者從事於「總理遺教編年」一書之撰述，也隨時在搜集和發現。日昨偶於「總理全集」中，檢得「總理軼文四篇，一曰「支那保全論」，二曰「介紹日本名醫高野太吉翁啓」，三曰「蔡榮議員尙君天德文」，四曰「致徐謙書」。特爲全部錄出，供我同志研究，並繫以考證。

一 支那保全分割論

「今天下之大事，無過於支那之問題矣。東西洋政家立憲之策者，其所倡者保全分割之二說。西洋之國分者曰：「支那人人口繁盛，其數居人類三分之一。其人堅忍耐勞，勤工作，善經商，守律法，聽號令。今其國衰弱至此，而人民生存競爭之場，猶非自強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舊弊，發奮爲雄，勢必凌白而居亞洲。則雖木真漢拿比之禍，必復見于吳日也。維持文明之禍，防塞黃毒之禍，宜分割支那，使之爲列強殖民之地。」倡保全者曰：「支那爲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國，與巴比倫、加利地諸古國，同時比美。而諸國者，已成邱墟。祇留殘碑遺址，爲學古者考據之資。惟支那其文明道德，自必有勝人者矣。且其人民爲地

球上最和平之種族，當最強盛之時，亦鮮有窮兵黷武，逞威力以服人者，其附近小邦，多感文德而向化。今雖積弱不振以自保，然皆清廷失德，有以致之；其漢民之勤忍和平，亘古如斯，未嘗失德也。凡全世界和平，維持人道，獎進文明者，不可不保全此老大帝國，助之變法革新，爲之開門戶，開實業，以通商而惠工，則地球各國，豈不實蒙其福也哉。」東人之倡保全者曰：「支那爲日本列強唇齒之邦，同種同文之國。若割裂而入於列強，則歐備之禍，他人所難。將來列強各施其保護稅法之政策，如佛之於安南，米之於菲島，必將今日自由爭競之極大商場，盡行圍鎖。日本位於亞東，環海而國，仿如英國之于歐西，已有地狹人稠之患。他日賴以立國者，亦必如英國以工業而勝爲根本。設使支那分割，豈嘗輕亡齒寒，是直禍吾根本，傷吾命脈，支那一裂，日本其必繼之。爲日本計，是宜保全支那，而保全支那志者，吾日本當出全力以抗之。」倡分割者曰：「清國政治頹敗，官吏貪污，上下相蒙，人不愛國。故有數百萬里之土地，四萬萬之人民，開墾通商，數十年於茲，得接載米文明，先於日本，然猶不能取法自強，而獨頑固閉關，先虛張自大，至今一敗再敗，形見勢絀。其國運如失孩之舟，至今一敗再敗，形見勢絀。其國運動，則倒行逆施，乘地賄俄，投虎自甘。我雖

欲保全之，而分割勢成，禍由自取，雖有賢慮，莫如之何者也。今列強已環其國土爲勢力圍，分割之局已定，保全之機已去。爲日本計，莫若因時順勢，與俄結盟，議之東併滿蒙，西聯伊犁；我則北收朝鮮，南領緬甸，以護邊疆，張我國勢。則大陸分南，我獨得一分，病夫遺產，我亦均沾一分。若暗于時機，昧夫形勢，徒托保全之名，適見其狂進而無當也。」西洋政家之言，其得失是非，姑置勿論。今請將東洋政家之言，其得失是非，姑置勿論。今二說各有所見，言保全者，若其於事理，言分割者，似順於時勢，然以事理衡之，則不能不爲別國勢民情兩原因而詳考之。就國勢而論，無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論，無可分割之理也。何以言之？支那國制，自秦政滅六國廢封建而爲郡縣，焚書坑儒，務愚黔首，以行專制，歷代因之。觀國家爲一人之產業，制度立法，多在防範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立法，與一姓之存亡無關係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從無監督政府之措施者，故雖自爲國，民自爲民，國政庶事，屢分兩途，大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別。政府與人民之交涉，祇有收納賦稅之一事，如地主之於佃人，惟其租稅無欠，則兩不過問矣。至滿清以異種入主中原，則政府與人民之隔膜尤甚。當入寇之初，屠戮動以全城。搜殺常稱旬日，漢族羈縻之人，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山澤遺民，仍有餘恨，復仇之念，至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 孫中山先生... 革命之目的... 民族之獨立... 國家之統一... 社會之進步...

二 介紹日本名醫高野太吉 翁啟

一翁，日本九州人，幼學漢法... 醫學之進步... 藥劑之改良... 衛生之注意... 醫術之精湛...

三 祭祭議員尚君天德文... 惟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十一月十日... 孫文以同志... 祭祭議員尚君天德文... 祭祭議員尚君天德文...

四 致徐謙書... 一季龍兒覽：兄以國公以國公... 委員之選定... 革命之進行... 國家之建設...

總理革命史話

謝君 輯

總理年十二即隨阿兄德彰公赴檀香山，德彰公在檀島經營農業，信譽顯著，為檀島澳門之領袖，稱 Mendonça, M. A. 家中懸掛關公神像，日夕令總理誦經禮拜，總理反抗甚烈。

總理在瑪慶氏醫學校畢業時，成績特優，名列第一，旋即回澳門行醫，成立中西藥房，對貧苦者一律不收藥費，並有贈送藥品之規定。在澳一年，醫道大行，聲譽日隆，並創格致書院，宣傳革命，旋引起他人之忌嫉，運動澳門葡政府，將有不利益於總理，乃離澳返廣州，另設中西大藥房，時番埠淋病流行，羣醫無策，患者苦之。一日，一老人忠者求診於總理，為之開刀割取，不日即愈。老人登報申謝，盛贊總理醫術如神，家稱之曰活藥院，醫術又大行，並設分局，以廣診濟。

總理二十八歲之年，上書李鴻章陳建國策。全文洋洋萬言，係在廣州醫館中所手草。稿筆請黃詠蕙就正於寓居漢口之聘相（太平天國狀元）全文僅更二字，大為嘆服。王乃為介紹於李鴻章之幕僚黃履泰。進見李鴻章轉請總理強之道。自上午八時至十時，至下午四時，李猶豫不敢決，最後明然曰：余年老矣，無能為也矣，改革事業，期汝為之。並命總理登陸總理出，總理見大局已無可為，革命之心益決。

與中會在港創立之時，並成立臨時政府，選舉大總統，楊衢雲為大總統及會長。鄧士良嚴斥之曰：「汝有何德望可負此重任，如不聽與孫先生，余即辭職。」總理力勸不可爭氣，至防大事，一切讓楊任之，苦力勸，其偉大可知。及一二革命失敗，楊敗亡台灣，一籌莫展，見總理大表憤慨，總理仍力勸其努力革命，旋極心灰意沉，回港任教，可見革命決非一時客氣所可濟事。

總理在廣州設醫局，與康有為之強學會會址相距僅數百步，強學會為康講學之地，大唱富強之道，總理以其志在救國，竭力與之聯絡，乃派黃詠蕙與康弟廣仁聯絡，來往甚密，但康頑固不化，惟我獨尊，始終未得要領。

戊戌政變以後，保皇黨紛紛亡命。時總理在日開歌，乃派官時赴天津當救康有為等，至日總理與見，暢談革命，康面有慚色，表示願共同努力。旋廣詠蕙光緒會稱授衣帝制，不忍中途棄之云云。康廣赴檀香山，護照及川費均為總理所給與。

戊戌政變以後，乘督辦生白口轉檀香山，大張宣傳「革命即保皇，保皇即革命」，時盡屬知識來開，均信此說，其遠德彰公亦受其欺騙，到處募捐，慷慨甚巨，我黨在檀島革命基礎，大受損害。總理痛心異常，致書斥之，乘覆書曰：殊途同歸，幸勿我責，抄畫一旋乘並赴澳門所至宣傳保皇，曠壞革命。

鎮南關之役，總理將商南總督代運軍火。康乘竟告密，械盡被破，不得已乃購運水泥百餘桶，揚言建築炮台，虛張聲勢，且以取信於人，總理之念智有如此者。

總理倫頓蒙難，亦為康有為之毒計，時清廷以百萬兩收銀購，總理頭，及被騙入使館，飲以一大箱裝盛。總理，輪運回國。時禁烟嚴，絕對無法與外界通訊。而待後受總理人格之感動，允為傳信至康德黎先生，將小信片匿於托坂中倒出，然後檢送康德黎先生，此消息在報發表以後，輿論大譁，總理始能得救出險。出險後每日赴倫頓圖書館，潛心博覽羣典，研究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形，時列事亦在倫頓，當各國圖書館看書，二大革命巨頭常相會面，研究難難至頻。

革命軍每次發難，總理均主在南方，以南方與海外交通最早，民氣較為開通，北方為清代帝都所在，不易有所作為，誠屬卓見，且開歷代統一之創局。

辛亥革命以後，總理回至南京，力主各省軍隊應速抵揚州以北，掃蕩帝制餘孽，不然則國家命難成功，而乘不之信，黨內同志亦不聽其主議。

三民主義

一九

總理庚子惠州之役

鄧慕韓

國父 中山先生於第二次革命，庚子（民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丙歷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其謀本之周，雖不如第一次革命乙未（民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丙歷一八九五年）惠州之役，然歷時之久，聲勢之大，使中外人士，咸知革命黨人行事非徒託空言，而舉動文明，具有巨大之威力者，實以此役為始。爰紀之如下：

先是，孫先生於庚子五月由日本啓程時，一面應李鴻章獨立之事而行，然李能否決心，孫先生猶在疑問，一面則預備軍械軍事。故過香港時，與各同志議決，派鄧士良運動東江會黨，史堅如、鄧蔭南在廣州運動八旗中之漢旗及軍隊，費學東、許近綠、林、畢永年運動湘軍。先由新安（現改黃安）歸善（現改惠陽）發動，進攻虎門要隘，直趨廣州，而粵垣黨人應之。計定分途進行。及先生由星洲乘日輪抵香港，知李鴻章動程北去，獨立之事無成。該船停留五日，乃得從容籌畫。遂定鄧士良為總司令，原植（他書作遠輝）為參謀長。又得同志李紀室初次來見，捐出三萬元。處置已畢，折回日本。復與平山周赴上海籌畫，澳唐才當受廣東之使，舉兵武漢失敗，影響所及，所謀遂轉渡台灣，擬由台灣渡內地。因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派長官長後藤新平與先生接洽，許以舉義後相助。於是先生一面擴充原定計畫，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鄧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廣州，先佔沿海

一帶地點，厚集勢力。以俟 先生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入內地，于閏八月十三（陳少白林叶琴謂係十五日，而林海山德壽則云十三日）在三洲田誓師，向沙頭進攻。該地駐有清軍一哨，（約一連）聞革命軍至，驚駭潰散，獲槍約三十桿。時集泉約有四百械半之。十五日，進克新圍。黃閣庭離陸兄弟率眾二百來會，衆漸至千。十七至新墟，十八向佛子劫出發。該處有敵兵二百。與戰，破之，繳械百餘。即馳到鴨仔埗，十九，到距惠州城二十里之永湖，二處均無敵兵。二十一，到白芒花，廿二，向平潭進，該地有清軍千餘，正擬造飯來攻，不意為革命軍先發制人，相持四五時，清軍不支，退却，為河所阻，溺斃百餘。有縣丞兼管帶杜風楷，亦為所虜，囚奉先生命，直趨廈門，以惠州非目的地，故不拘焉。平潭既捷，軍威大振，兵力已至三千，仍回白芒花，始拔隊至良井墟，復經平新、柔化、塘角、增光等墟，所至如入無人之境。二十六，由增光墟出發，十時抵三多觀前黑墨湯，（一作黃沙潭）與清軍千人戰，五時，敗之，遂入三多觀駐焉。不圖日本政府忽然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軍接洽，又禁武器出口以及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先生潛渡之計畫，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并令組織

紛紛成立參議會，以行議會政治。時汪精衛圖行刺攝政王被捕後尚在北京獄中，受袁世凱之運動，釋放後大呼南北應立即議和，並避說章太炎等風面鼓吹。總理見黨內外人士均反對其主張，痛心之餘，和議乃成。汪精衛之多變，於彼時即可見之。時 總理慨然曰：「如此革命雖十百次均不能成功也！吾等速作回粵再舉之準備。」

陳炯明叛變後，總理雖痛心，但只要陳書一悔過書便一切了事。陳固執不悟，及民十四總理在北京逝世，陳慨然曰：「余叛後，未見 總理！終身抱憾，悔之晚矣！」

五四運動時北方學生代表赴滬謁 總理，殷殷訓迪，一談五小時，耐心解釋，毫無倦色。此後 總理深感青年急需思想之領導，乃於百忙中趕寫革命文學說等革命文獻。

總理平日批答文件，多直接寫於原信封信箋上，既便捷，又節省。

民元某晚黨內同志于右任先生等聚集總統府中園於 總理之周，爭強 總理手疊作紀念，總理寫來寫去都離不了「博愛」「博愛」「大同」「大同」，四座歡笑，情誼融融，是何等親密精誠氣象。

民十一陳炯明叛變後 總理備 總裁回滬，在埠同志均列江干恭迎，衆皆以為 總理將何等興衰，何等憔悴，及登岸衆見其神采如昨，笑答諸問，

行事。二十七日，清軍與神達以大隊反攻三多說，相持至下午二時，山田良政忽至，軍中聞之，大放砲竹歡迎。距第二防線僅為勝利，遂被隊回還，第一防線見後方退，亦被隊而退，至六十里崎埔海軍心壇。清軍以革命軍無故退兵，不敢追，亦退至六十里平山壇。革命軍即開軍事會議。業以原定進兵廈門計畫，今已失敗，且子嗣漸缺乏，派軍以上，又無聯絡，再進實無希望，乃決定暫行解散。各隊伍退至沿海一帶，陸續散去。山田良政與會議夫同行散失，以致迷路。為吳祥達部下之洪兆麟（即後助陳炯明以叛孫先生，為海員章德所誅之人）所獲，在三多說西壇門口審之。山田遇害時，著有書裝，略論普通，外穿華服，內穿西裝，清軍猶不知其為日本人也。是役當時不過二旬，然兵力已至萬餘，沿途無廢墟，因之師行所至，鄉民歡迎，供給糧食。古人所謂「軍食警蹙以迎王師」者，不期復見於惠州之革命軍隊。先生以台詞之計畫不成，遂赴日本。

按關於庚子惠州之役記載，始見於日人官崎實藤所著之「三十三年落花夢」，其後馮自由所撰「中華民國開前革命史」多本之。然陳少白則官崎所記，俱得自遠述，所述不盡翔實，因當時不能留港親見其事也。林海山林叶琴，均在軍中，各有所述，然述有不同。今照林海山所述而錄耳。至用兵期間，自閏八月十三日起，至廿七八解散，始終不過二旬。先生自述謂連戰月餘者，係偶然之誤。

當革命暴發之際，香港政府派武裝警察五百人

三三三馬島華會刊

駐紮邊境。嚴守中立，不事干涉。後見革命軍極有紀律，舉動文明，該警務局長著有一文刊登德西報，力為稱許，及革命軍退兵，凡解除武裝者，均得退入英界。蓋英人已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矣。

史堅如以惠州義師既起，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遂，決意於九月六日自行用炸藥攻該署，（他時誤作春署）欲將署總督之德壽轟之。炸發不中，堅如被槍退者，嗚呼！烈矣！然自是革命黨之行事，益見信於國人。越二年壬寅，而有李紀堂洪全福廣州之役，再二年甲辰，而有黃興馬福益長沙之役。

史堅如殉難後，獲讀有十一月十二日清吏在香港暗殺楊衢雲之事發生，而先生竟不提及。有辰先生道忘此事者，不知楊君為首義之人，當惠州舉事時，楊曾與清吏立約投誠，並隨函勸先生降。（此事先生與陳少白屢為余言之）及堅如炸楊署，清吏辭職入，以楊自認黨魁，密使人殺楊於香港。是則楊雖死清吏之手，而致死之由，實歸於立約投誠，固不能與陳少白，朱寶全，區潤，魏查光，山田良政，史堅如，諸烈士同日而語，即先生為大總統大元帥時，即與亦不及。以故先生以其事不足傳，傳之適足以彰其過；置之，即所以全之。先生之用心良苦矣。後人以先生當日以楊身後蕭條，捐款養贖其家，出於私人交誼者，蓋以推即烈士者同例觀之，特附錄於此，以釋眾疑。

有感動下泣者，至私邸，不稍休息便立即在院中車地對諸同志作詳細報告，毫無倦容。總理之可愛若此。

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後，在廣東掛捕。總理者為譚延闓先生的父親。總理在北京逝世做敵時，段祺瑞適因足腫不能行走，乃派總理領家難時駐英領事館照會致款，相映之趣，有如是之巧者。

民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總裁就黃浦軍事政治學校校長職，第一期取五〇〇人，到四九人。時在粵各軍參加典禮者數萬人，大都心懷吳志，時廣東中有一高台，總理親授。總裁授印，典禮隆重，實為總理之拜將也！總理訓話後，總裁即席致詞，痛罵軍閥割據，大呼統一廣東，統一中國，四周在場參加之數萬軍隊，均為其指斥之對象，衆皆感汗！

總理唯一的嗜好是讀書，會審時都置書在旁，客人一去，即便看書，手不釋卷，一日馬超俊先生看一英國小說名著，總理問何書，馬先生以實對，曰吾憐革命方殷，怒日新聞政治經濟社會等典範，尚恐不及，何暇來看小說！

陳炯明叛變時，一日坐鐵廠彈如雨，死傷甚重，衆勸其下輪艇，不允，強挾之始入，旋同志入講，見其神情鎮定如常，挾帶細紙，其偉大有如此者。

附註：上述諸則有為陳果夫先生所口述者，有為馬超俊先生，羅家倫先生所口述者，有為筆者臨時記憶及者，確係以要讀者，如有錯誤，文責由筆者負之，懇請諒察。

總理信徒應有的努力 (續後記)

編者

三月十二日，是總理逝世十八週年紀念日。我們為了紀念這位革命的先知先覺者，本黨的偉大導師，特將一個「總理的生活與思想」的專輯，

這本專輯，分做兩部份：

一部份是關於總理思想的，有錢謙升先生「新秩序的建設」，梁雲漢先生「總理知難行易觀感之研究」，陳德輝先生「總理建設的政治哲學之探討」，葉青先生「總理自由思想申義」，呂德陽先生「總理的大同思想」，齊修生先生「總理教育思想述論」六篇文章。錢先生發表於西北各大學，為海內知名的政治學家，他這篇「新秩序的建設」，雖沒有提出「總理或三民主義的字樣，但對那漢和平中國的理想主義，却完全是符合「總理的思想的」讀者可以將上兩部專輯與先生「抗戰的困難與前途」參照此文參看，字樣本得還想多寫這一期試圖戰後建立永久和平的文字。梁先生和齊先生都已有一篇文章在本刊發表。錢先生現任湖北教育學院訓導長，梁先生是大家熟悉的。呂先生現在江西從事文化工作，著有開揚三民主義的專著多種。

另一部份是關於總理生活的，有鄧嘉驊先生「總理庚子惠州之役」，謝君穎先生「總理革命史話」，鄧文華先生「鄧先生追憶」，總理革命年表，所採史料甚豐；謝先生，對「總理與總裁實行的研究」，下筆尤很深，以爲兩位先生私常有文章在本刊發表。

此外，值得特別推許的，還有劉子健先生的「總理英文四篇及其考證」。劉先生繼本文之後，還著有另外九篇英文的考證。這些專篇較文的發見，無疑的，對研究「總理思想」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劉先生現在海防部工作，常有開揚主義的論著發表在各報刊。

總理遺教，到現在不啻已經十八個年頭。這十八年中，本黨同志在「總裁領導之下，從事革命建國的巨作，對內完成統一，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使國家走上自由平等的大道，當可欣慰。總理在天之靈，但一念及中興河山尚遺此駢跡，千百萬同胞尚受敵人奴役，總理陵墓尚爲僑僑玷污，則又廢食難安。因此，本黨同志，應當更加奮鬥努力，以行動來紀念「總理」；效法「總理的革命精神」；開揚「總理的革命思想」；完成「總理的革命事業」。我們繼續效法「總理的革命精神」，就可以立憲；能開揚「總理的革命思想」，進而可以立憲；能完成「總理的革命事業」，就可以立憲。今日的中國青年，要人人以「總理」三不朽的革命事業爲己任，爲全民衆爭生存，爲全世界人類謀福利。這是我们「總理信徒應有的努力」！這是我们「總理信徒應有的努力」！

編輯及發行者

三民主義半月刊社

重慶兩洋波路八十三號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各地航空版：

昆明版 昆明朝報附

重慶版 重慶兩洋波路青年團支團部

四零版 西安陝西青年團支團部

贛州版 贛州江西青年團支團部

立糧版 立糧安徽青年團支團部

恩施版 恩施湖北青年團支團部

訂購辦法：

零售 每冊壹元

訂閱 半年拾元

黨員團員學生軍人團體八折優待

郵費半年壹元貳角

書店經銷 優待七折

集體訂閱

內政部登記證七六號

中郵政登記證第一號

重慶郵政管理局字第一九八號

